

日共第十次大會後之動向

張棟材

一 前言

日本共產黨於本年十月二十四日至三十日在東京舉行了第十次大會，其堪為國際間注目者，乃是日共所喊出的並已正式通過大會決定了的要走「獨立自主」路線。蓋世人均知：日共原是具有以蘇俄、共匪為寄生母體的「二重附庸性格」，在成長過程中從活動資金之供應以至理論與戰術戰略的指導，幾乎不仰賴於這兩個母體的培育。因之，自這兩個母體發生激烈衝突之後，日共內部亦立即分裂為兩個極端對立的親俄派與親匪派之鬥爭。現在既然決定了要走獨立自主路線，這是不是就意味着日共的中間派羽毛已豐而對俄匪兩者都不再依從了呢？

綜觀這些年來，由於日共之二重附庸性格所使然，每當日共舉行大會前，都必然暴露出對環繞於對俄、匪關係的政策路線的爭執混亂；以及中央人事積不相容的傾軋現象。例如：

一、第七次大會（一九五八年七月）：清算恐怖暴力鬥爭的冒險主義，廢止「五一年綱領」，改由野坂參三任主席，宮本顯治任書記長，開除了志田重男、椎野悅郎等人。

二、第八次大會（一九六一年七月）：強行採用會引起內部反對的現行綱領，偏向於接近共匪立場之路線。開除了為此聲明脫黨的親俄派份子春日莊次郎、內藤知周等人。

三、第九次大會（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公開表示向共匪一面倒，並對蘇俄嚴加抨擊。在大會前開除了親俄派份子志賀義雄、神山茂夫等人。

四、接着，便是這次的第十次大會：日共早於數月前忽對共匪故示冷落與疏遠，且沿用以往手法，陸續開除了由中央以迄地方上的大批親匪派份子。

從這些例證中，人們不難明瞭日共的任何行動都擺脫不開來自俄匪兩方的影響力。那種二重的附庸性格不是一天所形成，也就不是一天能使其消褪得了的。當前在表面上看來，似乎是親俄派與親匪派失勢，中間派掌握了黨內權力，但有一點必須認出：所謂中間派並不是什麼新生力量，它却是從親俄、匪兩派中輾轉產生出來的一種變形，「獨立自主」只是它所戴上的面具。這個面具隨着時勢氣候的更易，也有許多摘下或戴上的便利。

關於日共的「獨立自主」路線，在日本國內並未得到若何較高的評價；而另外一批包括了自動脫黨與被日共開除的共產黨人們，則對此一致予以嘲笑式的駁斥。這些共產黨人都各成立有獨自的組織，如志賀義雄等之「日本共產黨（日本之聲）」；春日莊次郎等之「社會主義統一有志會」；志田重男等之「日本共產黨」（解放戰線）等，且亦有聯合共組另一日本共產黨與現有之日共對抗的趨勢。將來何者為真正代表日本的共產黨，還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哩。

本來日共之親共匪路線，是已成定局了的。但自宮本顯治率領日共代表團於今春訪匪歸來後，却有了對共匪疏遠的突變，這其中的原因為何，可從日共的若干動作上去找解答：

日共的「赤旗」報於五月十一日曾發表了一篇長文為「全黨學習大會決定為反美帝國際統一戰線的強化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真正的團結而奮鬥」，首次揭出了「日本共產黨（解放戰線）」的存在。這一派是由被開除了的原日共常任幹部會員志田重男所領導，其強調武裝鬥爭的主張係完全抄襲共匪，公開批評宮本等為「修正主義」。

離開日共的親俄派另作組織活動，為數不多，日共對其尙能相安。現在有了以共匪幕後支援為背景的「解放戰線派」來挑戰，則是日共所難忍的一種威脅。因此，我們可以推測日共之對共匪表示疏遠，可能主要是由此一刺激引起的。自此，日共便有一連串的杯葛共匪之動作，如：

一、「赤旗」報於六月五日開始停止刊出共匪廣播節目與「毛澤東選集」廣告，亦不再轉載「人民日報」社論，並停止報道有關共匪消息。

二、日共地方黨部均接到中央指令，禁止懸掛毛澤東肖像，並禁止閱讀共匪配發之「北京週報」等宣傳書刊。即左派劇人上演共匪劇本「紅岩」中之「毛澤東萬歲」口號，亦經下令刪除。

三、日共的「民主青年同盟」宣佈不參加今年在匪區舉行的第二次「青年友好大交流會」，暗示不支持毛匪澤東所掀起之「文化大革命」及「紅衛兵運動。」

其後，日共又於八月八日在「赤旗」報發表長文「再論強化反對美帝國主義之國際統一行動及統一戰線」，日本的政論家鍋山貞親會對此點指稱：

「須知這篇文章已經是對中共的分手宣言。文中雖然未會有一語提及中共，可是它的攻擊對象是專找到那自成一集團而以反代代木總部（日共黨部所在地）為務的志田重男一派，因為志田派的論調與中共的毫無二致，結果就等於以打志田派來試行反擊中共。」迨八月十日，「赤旗」報乃又緊接着刊出「為粉碎志田一派的反黨擾亂活動」一長文，將志田派的一切活動全部道出，這更可反映出日共對志田「解放戰線派」所感受的嚴重情勢。於是，日共在此時起至第十次大會召開前的一段期間，便大力進行了整肅親匪派工作，開除了地方上被視為親匪派大本營的山口縣黨部大批幹部；羣衆社團與國際組織團體內的親匪派份子；以及中央委員西澤隆二。

根據上述，我們可獲致下列印象：

一、「日共解放戰線派」為共匪對日之另一培養對象，企圖用以奪取或代替不聽命於共匪之現有日共。

二、日共將「解放戰線派」視為受毛匪澤東之嗾使，其為警戒而對匪疏遠之策略，似出於反毛之動機，與共匪內部之反毛勢力有默契之共鳴感。

在日本亦曾盛傳一項內幕新聞，謂當宮本顯治於今春訪匪時，在返國前曾在廣州附近與毛匪會談，毛匪要求日共應採取武裝鬥爭路線，宮本則以「

日本為資本主義發達之國家，為辭予以拒絕，乃致毛匪當場惱羞成怒而拂袖退席。此項傳聞與日共之對匪關係發展相印證，確頗具若干真實性，可供上述第二點的解說。野坂、宮本於第十次大會後在招待日本記者會中會宣稱：「日『中』兩黨對立說，不符合事實。我們並未批判中國的革命方式，只是在黨內說不可盲從他國的革命經驗而已。再說我們和『中國』亦未曾互相指名攻擊。」這一段話頗能道出日共對共匪疏遠的真相，其關鍵是日共不能接近共匪主要是毛匪強加於它的要求。野坂在日共第十次大會開幕辭中會再一次提出反「大國主義干涉」；「赤旗」報於十月廿九日又在長期停止報道共匪消息之後刊出共匪試爆核子飛彈新聞，用的雖是匪「新華社」原稿，但卻刪除其中有關所謂「毛澤東思想的勝利」等字句……諸如此類，都可顯示日共之對匪疏遠是對準今天只成為毛匪個人崇拜的共匪，在實質上是有反毛成份的，其對共匪內部之未來變化，還存有靜觀的期待。

三 宮本領導體制之確立

日共第十次大會的重要決定，是（一）通過強調獨立自主的中央委員會政治報告；（二）修改黨章；（三）改選中央人事。宮本為求這三大項目能依照預定通過，則已在大會前的黨內情勢上如大規模整肅親匪派份子，掃清了所有障礙。結果，一切都正如宮本的預想，這自是以宮本為代表的日共中間派亦即以獨立自主為號召的宮本領導體制的一次勝利。

新經選出的中央委員為野坂參三、宮本顯治、青柳盛雄等八十八人；（較上次增二十人）中央委員候補青山照明、阿部泰等四十九人（較上次增七人）；中央監察委員村上由、鶴飼長壽等七人（較上次減二人，惟原為「中央統治監察委員會」，現改分為二，另設統制委員會，由中央委員會直接任命委員五人，故在實際上則兩者人數相加較上次增三人）。

新的中央委員會在大會閉幕後即行召開，選出野坂繼任主席；宮本繼任書記長，這已是他兩人的第四任了。以野坂的黨齡與聲望論，在日共中已是僅存的最老與最高的一個，不過，此人屬於明哲保身型的兩面性共產黨人，他的鬥志衰退，影響到實力的結集，其保持高位乃是得之於尙有作招牌的利用價值。事實上，現在的日共是為宮本顯治所把持的。這次的新中央人事，

更為進一步地確立下宮本領導體制的基礎。其特徵是：

一、幹部會由十一人構成，宮本及其親信如袴田里見、岡正芳、藏原惟人、西澤富夫、松島治重、米原龍等共佔七名的超過半數。

二、書記局由十八人構成，宮本一手掌握。其原任書記而被目爲親匪派重要份子之安齋庫治、與身任日共代表長駐北平之砂間一良，均遭擠斥門外。且安齋竟亦未能獲得中央委員一席。

三、常任幹事會員由四人構成，即野坂參三、宮本顯治、袴田里見、岡正芳，在外表上固爲集體領導，然參照上述情形，即知大權已由宮本一人獨攬。

四、親匪派重要份子如岡田文吉、聽濤克己等均病死，想有所行動的西澤隆二亦已被大會追認開除黨籍，剩下來的則都表臣服宮本，內部的權力鬥爭將暫告一段落。

五、第十次大會的出席代表，平均年齡爲二十歲，且以黨歷二年以下者佔過半數，此爲宮本派新生一代的抬頭。八十八名中央委員內有二十五人是新人，其中如上田耕一郎、不破哲三、渡邊武等均爲宮本派的青年理論家與組織能手。

這次在修改黨章上，其着眼點爲嚴密並擴大組織；以及加強中央委員會的職權。後者如將大會召開期間由二年改爲三年；新設統制委員會而由中委會直接任命；執行黨律可先作斷然措置再報請追認等，更是爲建立宮本領導體制的必要鋪路工作。

目標，（惟據日本治安當局調查稱，日共之此項數字尚須大打折扣，計有百分之二十五的黨員未參加活動；「赤旗報與『星期增刊』」的銷路並不穩定，各有百分之十至二十的浮動讀者。）且日共的主要經費來源，亦藉此大見充裕。故在此次大會中，宮本尙特別以大會主席身份專就黨員及機關報讀者的發展情況，作了一次報告。

此次日共又喊了第三次擴大黨勢計劃，公開宣稱要積極達成「五十萬人前衛黨」的目標。其在修改黨章中對吸收黨員便作了若干加緊的權宜處置，如十八歲即可入黨；黨齡達六個月者即可介紹他人入黨；工人、農民作預備黨員可縮短爲五個月等，即爲其著者。

要言之，日共將盡全力來壯大它自己的勢力，其在國內的最後目標是奪取政權，在時間表上已劃出了日美安保條約滿期的一九七〇年。至其所宣稱之「獨立自主」路線，實乃由無條件地追隨共匪路線而作具有彈性的些微修改，修改的原因却正爲了要實現上述最後目標。因之，日共勢將重回過頭來和日本社會黨以至其他黨派聯合，以結成「民族民主統一戰線」的色彩來染它所戴的「獨立自主」面具。關於此項轉變，日共常任幹部會員之岡正芳則曾在公開演講中說明理由稱：「所有國家的革命黨，都必須判斷自己國家的情勢與條件，站在獨立自主的立場用自己的頭腦思想，自己的腳走路，才能使革命成功。日本是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有議會制度，有電視、廣播、和出版多種書刊的進步的資產階級新聞宣傳機構。爲了適應這樣發達了的資本主義國家，就必須講求各種各樣的複雜的鬥爭方法」。

日共在對內方面既然改變方針，在對外方面也就難免跟着有所改變。這恰如前面我們所指日共的二重附庸性格：它對共匪疏遠了，便很可能又靠向蘇俄；在以前當其充分倒向共匪時，原本是捨俄而就匪的，日共倒來倒去，不易跳出俄匪的掌心。

日共確又有再向蘇俄投靠的跡象，例如：

一、今年六月間蘇俄職工會主席格里辛訪日時，曾在日共黨部與日共幹部會談，所談內容始終祕而不宣。

二、日共「赤旗」報已恢復採用塔斯社稿，俄共眞理報亦登刊宮本之演說稿。

三、在尚以反修正主義對俄攻擊中，開始製造就俄意向的論據，如謂：

黨員，煽動羣衆運動。這可以說是日共真正的企圖即在於此，他如所謂強化國際統一行動戰線云云，實不過是對此一企圖的輔助手段，照日共的實力論，那是近於誇張地欺人之言。

在兩年前，日共於第九次大會中喊出了要在兩年之內增加黨員和機關報讀者兩倍的決定。據日共於本年九月初的發表所稱：現有黨員二十餘萬；赤旗報銷售三十餘萬份，「星期增刊」一百一十萬份，這已接近到它所預定的

「必須注意到最近蘇聯共黨領導部之路線與行動，都呈現出了某種的變化，已確實從事自我批判之改正。」（見本年八月八日「赤旗」報）

四、在有關越戰的論調上，已公然不顧共匪之猜忌而為蘇俄的立場與行動辯護，謂「蘇聯送往北越的高射砲和飛彈，能擊落美帝飛機，實有助於越南民主共和國之保衛。」（見同上）

• 上接第18頁 •

越南、高棉、寮國作各種斡旋工作，今後仍將隨時進行。

(三) 加強對韓關係，包涵了政治、經濟雙重意義，自去年十一月日韓正式復交之後，在整個東北亞反共體制上，填補上一個最大的缺口，使日本減少了受共黨侵略的威脅，也防阻了亞洲共產主義的對外擴張，在經濟上韓國正積極展開經濟建設，從明（一九六七）年起將進入第二個五年計劃，需要大量外資與工業設備，無疑韓國需要日本全力支持，故日本對韓外交，勢將加強。

(四) 日本對匪政策，一向標榜「政經分離」原則，擴展對匪貿易，該項基本方針，大致不會變更。但最近有一種跡象顯示，自民黨內部份人士，正開始與共匪接觸，似有為美匪間做搭橋工作的企圖。小坂善太郎前外長率領自民黨議員團訪匪，與周恩來、陳毅等匪酋會談，繼之於本月中旬訪問美國，與魯斯克國務卿等會談，除了傳達共匪對美態度外，且負有協調美匪關係、緩和美匪對立及斡旋越戰的任務，而小坂等行前，事實上已獲得佐藤政府的默許，故其發展，頗堪重視。

(五) 對我國關係，仍將維持友好政策，在國際事務上、經濟上、文化教育各方面，密切合作；只要日本對共匪政策無重大變化，中日關係必能繼續加強。

據最近日本報紙傳聞，十二月一日自民黨總裁改選後，隨即進行政府改組，因最近自民黨籍議員田中彰治因利用議員地位，發生恐嚇、逃稅等案被捕下獄，繼之在野黨又在國會檢舉運輸大臣荒船清十郎、農林大臣松野賴三、防衛廳長官上林山榮吉違法失職，雖然案情並不嚴重，但已使佐藤內閣，蒙上污點。佐藤首相為整飭內部，提高國民對自民黨的信任，已宣佈總裁選舉後，澈底改組內閣，因此，佐藤連任首相之後，必將貫澈此一諾言。據報椎名外相，可能調任黨務工作；雖然日本外交方針，不致因內閣改組及更換外長作基本改變，但如由親匪派出任外長，無疑對匪關係乃至對亞洲外交，將發生若干影響，必須予以密切注意。

(五五、一一、二八脫稿)
最相映成趣的是這一個新的「義大利共產黨」而附加M·L意即「馬列」於括弧內的組織，它歌讚毛匪路線，自稱為共產主義正統，叫囂進行世界武裝革命，這和日本親匪的志田重男派之「日本共產黨（解放戰線）」，幾乎是孿生兄弟。

在俄、匪互爭共黨集團領導權的衝突激化中，各地共產黨發生親俄、親匪派的對立，實為一通之現象。日共以宮本為代表的所謂變形中間派，雖有擺脫俄、匪影響力的念頭，並已戴上「獨立自主」的面具，其奈脫胎於俄、匪兩個母體，根本難以改變一重附庸性格何。